

产业内贸易、调整成本与中美贸易摩擦

柳剑平 张兴泉*

摘要: 本文通过对中美产业内贸易以及贸易摩擦产业分布状况的分析发现,在产业内贸易水平较高的产业中,中美贸易运行得较为顺畅,贸易摩擦大多发生在产业内贸易水平较低产业中。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在产业内贸易指数较低产业中,由于其进行结构调整所产生的调整成本较大,减少了相关利益集团的利益所得,从而引发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提高产业内贸易水平,强化同一产业内产品结构的互补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中美贸易摩擦。

关键词: 中美贸易摩擦 产业内贸易 调整成本

一、引言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在中美双边贸易额不断增加的同时,贸易摩擦也在不断升级。贸易额迅猛增长与贸易摩擦不断加剧并存成为当前中美经贸关系中一个较为突出的特点,中美贸易摩擦不仅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国内学术界对此也极为关注。

从目前国内外对中美贸易摩擦的研究来看,学者们关于中美贸易摩擦形成原因的观点大体可归为两大类。一类是政治原因:陈向阳(2000)认为大选前各利益集团的角逐是导致中美贸易摩擦的直接原因;苗迎春(2004)指出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遏制是导致双边贸易摩擦日益增多的主要原因之一;李淑俊等(2007)认为美国的官僚政治容易形成贸易保护主义,并导致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尹翔硕等(2008)则指出“边际保护思想使美国贸易政策偏向于保护夕阳产业从而滋生和激化中美贸易摩擦”。另一类是经济原因:美国贸易报告(2005)认为造成美中贸易摩擦的重要因素是中国政府为本国出口型企业制定的补贴性政策以及对外国企业的准入限制,同时人民币币值低估和中国工人恶劣的工作条件带来的低成本优势也是形成贸易摩擦的原因;雷达等(2004)指出中美之间贸易摩擦的根源在于两国经济结构调整过程的特征和潜在的互补关系;赵建(2004)则认为国际间产业结构不相匹配乃是引发贸易摩擦的深层原因;胡方等(2005)强调经济制度的缺陷有可能导致中美贸易摩擦;胡静寅(2006)则指出经济民族主义是中美贸易摩擦形成的根本原因。

现有这些对中美贸易摩擦形成原因的研究主要关注利益集团、官僚政治、边际保护、产业结构和制度差异以及经济民族主义等因素,还没有从双边产业内贸易这一角度对其进行分析。产业内贸易是当今国际贸易发展的新趋势,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产业内贸易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产业内贸易与调整成本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对两者关系的研究中,学术界流行的一种观点认为,资源在产业内而不是跨产业流动时,贸易的发展会带来较低的要素调整成本,即Balassa(1966)提出的“平滑调整假说”。围绕“平滑调整假说”,大量文献进行了理论和实证检验。Brulhart和Elliott(2002)通过运用工人的失业率和工资的变化情况作为变量衡量了调整成本对欧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影响,发现各国间产业内贸易水平的提高,减少了要素调整的摩擦成本,从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Brulhart和Thoipe(2000)对爱尔兰以及Greenway、Hines和Milner(2002)对英国的分析等都通过不同国家具体行业的数据证实产业内贸易与劳动力要素调整成本之间的关系,并为“平滑调整假说”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然而,随着产业内贸易的不断发展和研究的深入,该假

* 柳剑平,湖北大学商学院,邮政编码:430062,电子信箱:liujp621@163.com;张兴泉,湖北大学商学院,邮政编码:430062,电子信箱:reggiecheung@hotmail.com。

说不断受到挑战。Lovely和 Nelson (1999)通过将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植入一般均衡模型,将产业内贸易与产业内调整相联系,发现以前关于产业内贸易只会导致产业内调整的假设并不成立,产业内贸易通常会引发产业间调整,同时,增加的产业内贸易通常会致相对要素价格的长期变化;Brulhart和 Thøpe (2000)以及 Guzin Erlat和 Haluk Erlat(2003)分别对马来西亚和土耳其的数据进行检验,结果也都与“平滑调整假说”相背离。

在以上文献的研究基础上,本文试图从产业内贸易的劳动力要素调整成本的角度对中美贸易摩擦进行分析。文章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测算中美各主要产业的产业内贸易指数;第三部分分析中美贸易摩擦的产业分布状况并揭示中美贸易摩擦与产业内贸易水平之间存在的关系;第四部分利用中美贸易数据对“平滑调整假说”进行验证,并以检验结果为基础对中美贸易摩擦与产业内贸易水平之间的联系进行理论阐释;最后一部分就如何加强中美贸易的产业内分工联系,提高产业内贸易水平,并最终缓解中美贸易摩擦提出一些对策。

二、中美产业内贸易的实态

产业内贸易是指一个国家既出口又进口同一个产业内产品的交易行为,它是在具有相同或相似生产要素禀赋的国家间进行的满足不同消费者偏好的一种贸易。与之相对应的是产业间贸易,它是在具有完全不同类型的生产要素禀赋的国家间进行的一种贸易。

对产业内贸易进行研究的基础是如何对产业进行界定。从统计的角度来看,国际贸易中对产业分类通行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国际贸易标准分类(简称SITC编码),另一种是国际协调商品名称和编码制度分类(HS编码)。目前在海关进出口数据的统计中,均依照HS编码进行商品和产业的分类,而学术界一般将SITC细分到3位数或HS细分到章的产品分组为一个产业。本文选择联合国商品和贸易网站(<http://comtrade.un.org>)提供的按海关HS编码分章统计的2002-2007年中美进出口数据为样本,考虑到农产品受到政府补贴和进出口政策的影响而容易产生歪曲,作者只计算2007年占中美双边贸易总额近3/4的21项工业原料或制成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以此来衡量中美双边产业内贸易水平(见表1)。

表1 2002-2007年中美产业内贸易G-L指数

HS代码	名称	G-L指数						加权 IIT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8章	无机化学品、化合物	0.613	0.703	0.963	0.921	0.95	0.914	0.876
29章	有机化合物	0.978	0.825	0.765	0.915	0.939	0.99	0.91
39章	塑料及其制品	0.645	0.7	0.783	0.739	0.711	0.85	0.754
40章	塑胶及其制品	0.431	0.484	0.424	0.388	0.386	0.375	0.398
42章	箱包、皮革制品	0.015	0.012	0.004	0.006	0.002	0.002	0.006
44章	木及木制品	0.554	0.494	0.396	0.381	0.351	0.38	0.398
48章	纸、纸浆及纸制品	0.826	0.958	0.953	0.824	0.671	0.657	0.756
61章	针织服装及附件	0.002	0.002	0.003	0.002	0.001	0.002	0.002
62章	非针织服装及附件	0.006	0.006	0.004	0.003	0.002	0.002	0.004
63章	其他纺织品	0.007	0.009	0.011	0.011	0.008	0.009	0.009
64章	鞋靴类制品	0.018	0.023	0.022	0.023	0.025	0.027	0.024
72章	钢铁	0.837	0.4	0.877	0.966	0.443	0.617	0.676
73章	钢铁制品	0.2	0.209	0.163	0.156	0.146	0.282	0.17
84章	机械器具及零部件	0.506	0.442	0.418	0.374	0.346	0.347	0.386
85章	电机、电气设备及零部件	0.571	0.463	0.453	0.379	0.405	0.363	0.414
86章	铁道车辆及设备	0.05	0.02	0.022	0.052	0.202	0.136	0.093
87章	公路车辆及设备	0.233	0.321	0.275	0.307	0.36	0.472	0.358
88章	航天航空器及零件	0.057	0.095	0.071	0.063	0.095	0.098	0.084
90章	光学、照相、医疗设备	0.857	0.77	0.79	0.976	0.92	0.97	0.9
94章	家具、灯具等	0.021	0.018	0.019	0.017	0.014	0.017	0.017
95章	玩具、运动品及零部件	0.007	0.008	0.008	0.01	0.009	0.01	0.009

数据来源:根据联合国商品和贸易网站(<http://comtrade.un.org>)数据整理得出。

对产业内贸易水平的分析一般采用格鲁贝尔-劳埃德指数,即G-L指数,这是迄今为止最具权威的产业内贸易测量指标,其表达式为: $IIT_i = [1 - |X_i - M_i| / (X_i + M_i)] \times 100\%$, 其中, X_i 代表第 i 类产品的出口额, M_i 表示第 i 类产品的进口额, IIT_i 表示第 i 类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反映产业或产品类贸易中发生重

叠式贸易的比例。G-L指数的数值在0~1之间变化,当 III_i 接近0时,该国该产业的产业内贸易的程度较低,互补性贸易占据主导,进出口更接近于产业间贸易;当 III_i 接近1时,则该国该产业的产业内贸易的程度较高,竞争性贸易占据主导,进出口更接近产业内贸易。一般以0.5作为区分产业内贸易或产业间贸易的标准, III_i 值在0.5以上认定该产业为产业内贸易, III_i 值在0.5以下则认定该产业为产业间贸易。

根据表1提供的数据,可以把这些产业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包括箱包、皮革制品(42章),针织服装及附件(61章),非针织服装及附件(62章),其他纺织品(63章),鞋靴类制品(64章),钢铁制品(73章),铁道车辆及设备(86章),航天航空器及零件(88章),家具、灯具等(94章),玩具、运动品及零部件(95章)等产业,这一类产业的加权 III 以及单个年份的 III 大多数较小甚至趋近于零,并且从时间序列来看,这些产业的 III 还有进一步下降的趋势,可视为完全产业间贸易产业;第二类包括塑料及其制品(39章),塑胶及其制品(40章),木及木制品(44章),纸、纸浆及纸制品(48章),钢铁(72章),机械器具及零部件(84章),电机电气设备及其零部件(85章),公路车辆及设备(87章)等产业,这一类产业的加权 III 以及单个年份的 III 大都介于0.2~0.8之间,产业内贸易指数有进一步向上提升的趋势,有的产业甚至接近产业内贸易,可视为准产业内贸易产业;第三类包括无机化学品、化合物(28章),有机化合物(29章),光学、照相、医疗设备(90章)等产业,这一类产业无论加权 III 还是单个年份的 III 都接近产业内贸易,而且 III 也有进一步加强的趋势,可视为完全产业内贸易产业。

从上面对三大类产业的贸易指数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中美之间的贸易主要是以互补性的产业间贸易为主,竞争性的产业内贸易还比较少,尽管第二类产业中大都具有向产业内贸易发展的趋势。中美之间这种产业内贸易实态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美国出于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逐渐把一些劳动密集型(大多分布在第一类产业中)的“夕阳产业”转移到中国,使得这些产业的 III 正逐渐下降;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积极向产业链高端靠拢,中美之间一些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大多分布在第二、三类产业中)的 III 也在不断提升当中。

三、中美贸易摩擦的产业分布

中美贸易摩擦一般表现为反倾销、反补贴、特别保障措施以及特别337调查,由于特别337调查与产业内贸易联系不强,故本文只分析前三种贸易摩擦的产业分布情况。依据贸易救济网(<http://www.cacs.gov.cn>)提供的信息,本文对2002-2007年间美国对华发起的这三种贸易摩擦案例的产业分布进行了统计。

表2 2002-2007年美国对华贸易摩擦的产业分布状况

	03章	28章	29章	32章	38章	39章	40章	48章	61、62章	73章	81章	84章	85章	87章	94章
反倾销、反补贴	1	7	5	2	1	2	1	4	3	12	1	1	2	3	2
特别保障措施	-	-	-	-	-	-	-	-	22	3	-	1	-	-	-

注:表中贸易摩擦数量以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公布的被调查的产业立案数量为依据。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http://www.cacs.gov.cn>)案件最新信息统计而成。

中国入世后,美国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摩擦涉及产品类别多达73类,其中有69类产品包含于表1所统计的产业之中(由于第61、62章在HS编码中都属于纺织服装大类,为了便于分析本文在统计中将其归类同一产业),占总立案数量的94.5%。从表2的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对华贸易摩擦的具体行业分布排序为:纺织服装类产品;钢铁制品;无机化学品、化合物;有机化合物;纸、纸浆及纸制品;公路车辆及设备;塑料及其制品;电机、电气设备及其零部件;玩具、运动品及零部件;染料;冷冻或罐装暖水虾、石蜡蜡烛以及镁合金及纯镁等。

综合表1和表2,可以发现中美贸易摩擦的2/3以上发生在纺织服装(61、62章)、钢铁制品(73章)等第一类产业内贸易指数较低产业中;而在以产业内贸易指数较高的化学化工(28、29章)、塑料制品(39章)、纸制品(48章)、公路车辆及设备(87章)、机械和机电产品(84、85章)等为主体的第二、三类产业中,贸易摩擦发生的次数则相对较少,不到总数的1/3。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产业内贸易发展程度对各产业贸易摩擦的发生数量具有负向影响,在产业内贸易水平较高的产业中,中美贸易运行得较为顺畅,中美贸易摩擦大多发生在产业内贸易水平较低产业中,特别是劳动密集型的纺织服装产业,中美产业内贸易指数与各产业贸易摩擦发生的数量总体上具有反向特征。至于产业内贸易与贸易摩擦之间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关系,这便是下文将要讨论的问题。

四、中美贸易摩擦的形成机理

在当今的国际分工体系下,一方面,由于中美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无前向经济联系,在一些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中中国加工贸易的原材料往往并不直接从美国进口;另一方面美国出于产业结构调整 and 升级的考虑也会逐渐把一些劳动密集型的“夕阳产业”转移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处于价值链低端的国家,这两方面因素就会使得中美这些产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较低。而美国国内的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往往会带来相应的调整成本,其中一项成本就是指当劳动力市场在需求与供给条件变化后未能及时出清而导致暂时性效率低下时产生的损失成本(Burthart, 2002)。

衡量调整成本的一个广泛使用的方法是测度贸易变动中产业内贸易所占的份额。这一方法来源于Balassa(1966)的“平滑调整假说”,其基本观点是:与产业间贸易相比,产业内贸易的调整成本(劳动力失业以及资产重新安置成本)可能更低。这是因为产业内贸易作为同类商品的交换,其要求生产商品的劳动力技能的相似性必然高于产业间贸易,同时,由于其他互补性生产要素在同一产业内可能更具流动性,也使劳动力市场在较小的工资调整下就能够获得均衡(Burthart, 2002)。

在“平滑调整假说”的验证方面,本文借鉴Burthart和Thope(2000)在分析马来西亚产业内贸易时所采用的模型对中美贸易数据进行检验,模型表示为:

$$DEMPL_{it} = \alpha_0 + \alpha_1 DCONS_{it} + \alpha_2 DPROD_{it} + \alpha_3 TREX_{it} + \alpha_4 IIT_{it} + u_{it}$$

其中, $EMPL_{it}$ 表示 i 产业从第 $t-n$ 年到第 t 年就业量变化的绝对值,用于代替劳动力市场中的调整成本,这是由于我们假设在任何产业、任何时间段内劳动力跨产业流动成本与工资支付的净变化量都是相互对应的; $DCONS_{it}$ 表示 i 产业从第 $t-n$ 年到第 t 年预计国内消费量变化的绝对值,其计算公式为 $C = Q + M - EX$, 其中 Q 是指该产业本年的总产出, M 是进口量, EX 是出口量,该变量预估值为正; $DPROD_{it}$ 表示 i 产业从第 $t-n$ 年到第 t 年劳动生产率变化的绝对值,劳动生产率以单个劳动者一年内的产出表示,该变量预估值为负; $TREX_{it}$ 表示对外经济依赖度,其表达式为 $TREX = (M + EX) / Q$, 该变量预估值为负; IIT_{it} 是以 $G-L$ 值表示的产业内贸易指数,该变量预估值为负,因为根据“平滑调整假设”,当某产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越高时,其调整成本就会越小,也就是说其调整所造成的就业量变化就会越小。

基于数据可获得性的考虑,本文根据北美产业分类标准三位码(NAICS Rev. 3)对2000-2006年中美两国除农产品之外的19项(313~316, 321~327, 331~337, 339)制造业进行分类,就业数据选自美国劳动统计局网站(<http://www.bls.gov>),其他经济数据选自美国经济分析局网站(<http://www.bea.doc.gov>),共获得570个样本数据。在时间间隔的选择上,Burthart(2000)认为以一年为周期的数据在SAH检验上具有最为显著的结果,因此,本文在数据统计上均以一年为时间间隔期。另外,为消除异方差影响,本模型对所采用的数据进行了自然对数处理。

本文利用Eviews 6.0软件估计了上述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通过Hausman检验,我们选择了固定效应模型的结果,估计的结果如下:

$$DEMPL_{it} = -0.220DCONS_{it} + 0.131DPROD_{it} - 1.715TREX_{it} - 0.268IIT_{it}$$

(-2.230)** (0.920) (-5.455)*** (-2.952)**

调整后的 $R^2 = 0.505$, $F = 5.218$

回归结果表明:(1)消费量变动($DCONS$)对就业量变动具有负向影响,在5%的水平上显著,与预估值不一致,这可能与美国对中国的净出口占美国对世界净出口的比重有关;(2)对外经济依赖度($TREX$)对就业量变动具有负向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与预估值相同;(3)产业内贸易水平(IIT)对就业量变动具有负向影响,且在5%的水平上是显著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对劳动力就业量变动具有明显的抵减作用。

中美之间贸易数据的回归结果对“平滑调整假说”的验证表明,在中美产业内贸易水平较高的产业中,即使该产业需要进行结构调整,其调整成本也会较小。而在一些劳动密集型第一类产业中,产业内贸易指数大都在0.2以内,产业内贸易水平较低。因此,当美国国内出于资源重新优化配置的考虑而对这些产业进行调整时所产生的调整成本就会较高,一方面该产业会产生大量需要在其他产业再就业的工人,另一方面会有较多的该产业原有资产得不到充分有效的利用。在这种情况下,产业结构的调整就会导致社会福利的损失,这也必然会造成美国国内相关就业群体利益所得的减少。所有贸易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福利的改进,理论上讲中国对美国大量出口特定产业的产品对美国整体的贸易利益是有所改进的,但在实际过程中这种贸易

利益所得并不是在各就业群体之间平均分配。

作为不同就业群体的代表,利益集团影响美国贸易政策的路径主要是提出实行某项特殊的贸易政策要求,国会和行政部门做出反应,继而引发国内各不同利益集团关于贸易政策的辩论与游说,最终形成一定的贸易政策与措施(柳剑平等,2008)。如果这项政策或措施加强了对国内相关行业的保护,则会引发与国外的贸易摩擦。以中美纺织品贸易摩擦为例,纺织业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业人员多,容易得到政府的关注和同情。美方挑起纺织品贸易摩擦的一个重要理由便是纺织品配额取消后,来自中国的纺织品进口影响到美国近百万蓝领工人的就业,使得一千多家纺织服装工厂有倒闭的危险,美国因此启动纺织品特保措施对中国纺织品出口到美国进行限制,这说明政府对利益集团利益所得的关注是引发贸易摩擦的重要原因。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中美产业内贸易对两国贸易摩擦形成的传导机制。中国在某一特定产业对美国出口额十分巨大,进口额相对较小,产业内贸易指数较低,美国国内在对这类产业进行结构调整时必然产生较大的调整成本,从而减少相关就业群体的利益所得。这会导致代表该就业群体的利益集团对政府贸易政策的制定施加压力,而对中国这些产业的出口施加各种形式的贸易限制或直接要求人民币升值就成为美国政府缓解这种压力的方式,同时这也就成为了中美贸易摩擦形成的直接原因。

五、结论与对策

通过对中美产业内贸易、贸易摩擦产业分布和产业调整成本规律的分析与讨论,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那些产业内贸易水平较高的产业中,中美贸易运行得较为顺畅,而贸易摩擦则大多发生在中美产业内贸易水平较低产业中,中美产业内贸易指数与各产业贸易摩擦发生的数量总体上具有反向特征。既然中美贸易摩擦的发生与产业内贸易水平高低有内在联系,我们就可以从提高中美贸易的产业内分工程度着手,强化在同一产业内产品结构的互补性,最终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美贸易摩擦。

(一)提高产品差异化水平,强化中美在同一产业内产品结构的互补性

重视和强化产品差异化是进一步发展中美产业内贸易的微观内核,也是扩大中美经贸合作,减少贸易摩擦发生的重要途径。首先我们要适当鼓励技术含量和产品差异化程度都较高的电子机械、通讯设备等生产的发展,加快制成品贸易模式由以垂直差异化产品产业内贸易为主向以水平差异化产品产业内贸易为主的转变。其次,产品差异化不但体现在质量和技术的垂直差异上,更重要的是要体现在对产品的营销等方面的水平差异上,例如广告、包装、售后服务的差异性,这些差异性极大地增加了产品出口的附加值。事实上,中国目前的许多产品在垂直差异上已经超过发达国家,但由于缺乏著名的品牌和可靠的销售渠道而不能在国际市场上获得应有的价格,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产业内贸易水平的提高,中国的企业应积极介入产品销售领域,形成一套统一、完善的国际营销机制,强化产品的差异性,从而创造出中国的国际名牌,使这些产业尽快加入到产业内贸易中去,并获取应有的利益。

(二)增加研发投入,促进中国在国际产业价值链中位次的提升

中国的制造业企业还没有掌握关键的核心技术,目前只能从低端做起,加大科研经费的投入,不断学习和吸收国外的管理经验和先进技术,逐步向上一级具有较高附加价值的环节挺进。“入链”企业在企业竞争力提高后,就可以逐步发展诸如来料、带料加工的对外投资,将产业向结构梯度低的国家转移,当然,我们也不能满足于这样一个下游生产商的角色,要在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竞争的基础上,提高核心零部件的本土化生产水平,由下游生产商向上游生产商推进,强化生产环节与技术研发的相关性,并适时向产业链条的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环节渗透,从而逐步提升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与加工增值能力。

(三)建构宏观调控机制,发挥政府在资源整合和产业调整方面的作用

在中美产业内贸易发展中,政府的宏观调控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首先,政府应建构更为合理的激励机制,促进企业更多地注重和追求规模经济效益,通过对主导产业部门的重点保护带动其他产业部门的发展,以及对瓶颈产业和薄弱产业的重点扶持来缓解结构性约束;其次,应加强与发达国家间的国际合作研究、开发和生产,加快中国产业技术改造,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最终实现规模经济,获取动态递增的贸易利益;最后,应优化产业组织政策,利用市场化和法制化的手段来协调各条块之间的关系,打破行政性垄断,统一国内市场,推动各地区企业间的吸收、兼并与联合以达到基本规模,提高产业部门的集中度,规范扰乱市场秩序的竞争行为,培育有利于规模经济发展的市场结构。

参考文献:

1. 陈向阳:《从国际制度角度看冷战后的中美关系》,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1)。
2. 胡方、余炳雕:《入世以来的中外经济摩擦:现状、原因与对策》,载《东北亚论坛》,2005(6)。
3. 胡静寅:《中美贸易摩擦中的经济民族主义分析》,载《国际经贸探索》,2006(4)。
4. 李淑俊、倪世雄:《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政治基础》,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7)。
5. 雷达、于春海:《内外均衡、结构调整和贸易摩擦》,载《世界经济》,2004(8)。
6. 苗迎春:《对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的重新审视》,载《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
7. 唐宜红、徐世腾:《政府对利益集团收入的关注与贸易摩擦的形成》,载《国际贸易问题》,2007(6)。
8. 尹翔硕、李春顶:《边际保护、加权福利与中美贸易摩擦的成因》,载《财经问题研究》,2008(4)。
9. 赵建:《国际贸易摩擦背后的产业结构和政治因素》,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4(3)。
10. 柳剑平、刘威:《美国对外经济制裁问题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11. Balassa, 1966 "Tariff Reductions and Trade in Manufacturers among the Industrial Countrie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3, pp. 466 - 473.
12. Brulhart, M., 2002. "Marginal Intra - industry Trade: Towards a Measure of Non - disruptive Trade Expansion," in P. J. Lloyd and Hyun - Hoon Lee, eds., *Frontiers of Research on Intra - Industry Trade* London: MacMillan, pp. 65 - 91.
13. Brulhart, M., 2000. "Dynamics of Intra - Industry Trade and Labour Market Adjustmen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8, pp. 420 - 435.
14. Brulhart, M. and Thope, M., 2000. "Intra - Industry Trade and Adjustment in Malaysia: Puzzling Evidence" *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 Vol 7, pp. 729 - 733.
15. Brulhart, M. and Elliott, R., 2002. "Labour - Market Effects of Intra - Industry Trade: Evidence for the United Kingdom."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 Vol 138(2), pp. 207 - 228.
16. Greenaway, D.; Haynes, M. and Milner, C., 2002. "Adjustment, Employ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Intra - Industry Trade"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 Vol 138(2), pp. 254 - 276.
17. Lovely, M. and Nelson, D., 1999. "Factor - Market Adjustment to Inter - Industry and Intra - Industry Trade in a Division of Labour Model" *Nottingham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 for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Labour Market Adjustment"*.
18. Erlat, Guzin and Erlat, Haluk, 2003. "Intra - industry Trade and Labour Market Adjustment in Turkey." *Electronic Journal*, Volume 5.
19. Thope, M. and Zhang, Zhaoyang, 2005. "Study of the Measurement and Determinants of Intra - industry Trade in East Asia" *Asian Economic Journal*, Vol 19, pp. 231 - 247.
20. U. S Trade Representative, 2005. "National Trade Estimate Report on Foreign Trade Barriers" Washington, D. C., March, p. 94.

(责任编辑:刘成奎、彭爽)

(上接第 96 页)

10. De Carolis, Donna Marie, 2003. "Competencies and Inability in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An Analysis of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Firm Performance" *Journal of Management*, Vol 29(1), pp. 27 - 50.
11. Gavimani, S., 1999. "Value of Information in Capacitate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Science*, Vol 45(1), pp. 16 - 24.
12. Lenke, Fred; Goffin, Keith and Szejczewski, Marek, 2003. "Investigation the Meaning of Supply - Manufacturer Partnership: An Exploratory Stud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hysical Distribution & Logistics Management*, Vol 33, No 1, pp. 12 - 35.
13. Malhotra, N. K., 1999. "Marketing Research: An Applied Orientation" *Pharmaceutical Executive*, Vol 10, June, pp. 16 - 18.
14. Wing, Larry and Perry, Glynn 2001. "Toward Twenty - First - Century Pharmaceutical Sales and Operations Planning" *Pharmaceutical Technology North America*, pp. 20 - 26.
15. Birkhead, Newton and Schirmer, Robert, 1999. "Add Value to Your Supply Chain" *Transportation & Distribution*, Vol 40(9), Sep., pp. 51 - 60.
16. Kager, Patrick and Mozeson, Mark, 2000. "Supply Chain: The Forgotten Factor" *Pharmaceutical Executive*, Vol 20, June, pp. 84 - 96.
17. Miles, Roger and Breen, Liz, 2005. "Pharmaceutical Supply Chain—Update on the Current NHS Review." *Hospital Pharmacist* Vol 12, Mar., pp. 41 - 42.
18. Oswald, Sharon L. and Boulton, William R., 1995. "Obtaining Industry Control: The Case of The Pharmaceutical Distribution Industry."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Vol 38(1), Feb., pp. 138 - 162.
19. Veleva, Vesela; Hart, Maureen; Greiner, Tim and Crumbley, Cathy, 2003. "Indicators for Measuring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a Case Study of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Benchmarking*, Vol 10(2), pp. 107 - 119.
20. Vaessen, Willem, 2000. "Concentrating on Profits? Focus on Your Supply Chain" *Pharmaceutical Technology Europe*, Vol 12(1), Jane, pp. 34 - 37.

(责任编辑:陈永清)